

# Folk Culture in the Novels by Bai Writer Jing Yi

Xiongjuan Su Xiaofei 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 Abstract

Jing Yi, a Bai writer who has the dual identity of minority writer and female writer,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her personal creative vision. The novel creation in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er creative vis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novel of female Bai writer Jing Y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Bai folk culture on Jing Yi's novels by studying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Bai folk culture in Jing Yi's novels.

## Keywords

Jingyi; folk culture; choice; transcendence; influence

## 白族作家景宜小说的民俗文化

苏雄娟 尹晓菲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 摘要

兼有少数民族作家和女性作家双重身份的白族作家景宜,其不同时期的创作类型反映了她个人创作视野的变化,其中早期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她创作视野的基础。本文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景宜小说中白族民俗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探究白族民俗文化对景宜小说的影响。

## 关键词

景宜; 民俗文化; 择取; 超越; 影响

## 1 引言

上世纪80年代,女性意识觉醒的白族女作家景宜从中国文坛迅速崛起,她的写作类型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到90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影视文学创作。<sup>[1]</sup>这个过程中她的写作视野也从本民族生活文化转为对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扩充。从大理白族故事到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她由“最会讲故事的金花”到“最会讲故事的人”,她的蜕变也反映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对白族民俗下女性自身生命的关注和审视以及对和谐文化、尊严平等的提倡。

白族民俗的运用取舍是景宜小说的关键。在白族民俗活动中景宜把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对象化在白族民俗活动中,像语言文字一样白族民俗获得了一种媒介的作用,她的作品表达出来的对白族民俗的继承与超越就是通过对白族民俗的情感认同获得的。这种情感认同与她自身鲜明的民族性密不可分,由此在她的小说中白族物质生产生活民俗和白族社会民俗都实现了继承与超越。

## 2 景宜自身鲜明的民族性

民俗以其活泼新鲜的生活外貌作为民族的标志,但同时又蕴藏着丰富复杂的民族意识,世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千差万别,风俗里隐藏着只有本民族人民才能理解的思想意识以及本民族人民才有的情绪体验。<sup>[2]</sup>在这种情况下,民俗的民族性最突出。因此,景宜的小说恰当地表现白族民俗事象显化其中的民族意识就使得她的民族性鲜明突出。

景宜小说中对白族民俗文化的极其重视显示了其鲜明的民族性,她把对大理这片土地的情感倾注在她的小说中。景宜在她的小说实践中,给我们留下了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小说作品,她那种艺术家式感知白族生活世界的方式、含蓄细腻的处理文字的技巧和她的作品中展现出来的乡土气息、人物的性格特点,无不显示出一种深入骨子里的鲜明的民族性。如《新船》中“‘船呵!只要世界上有你,我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人!’他扶着新船哭了好久,仿佛把这一生的委屈都倒尽了。”生活在洱海边的老船匠对船这一白族交通民俗的坚守与执着在

景宜笔下溢于言表，这与景宜自身鲜明的民族性分不开，她的小说在大理展开，小说主人公的人格也在大理成长、完善，大理这一美丽神秘的地方哺育了白族人民。

反观白族的历史与现状，景宜作为小说创作的主体，绝不是一个游离于白族现实社会的人，早在她进行小说创作之前的时代，她就开始接受白族民俗文化环境的塑造，许多白族民俗习惯逐步凝聚在她的骨髓里，溶化在她的血液中。如《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白姐的前半生在小说中得以展现，景宜对白族民俗文化的深刻领悟使白姐这一形象鲜活，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透露着白族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她又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基础上，对白族民俗传统有清醒的认识，避免完全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如在《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白姐觉醒的女性意识正是来源于景宜本身接受现代教育之后女性意识的觉醒，白姐这一形象成为景宜对白族女性生活现状思考的产物，这中间存在着继承与超越。景宜最初继承白族民族文化，她才能深刻理解和高度领悟小说中的环境特点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获得一种与白族地域中的人民相契合的情感积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别林斯基指出：“一个要想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人民的精神面貌的诗人来说，只有当他的天性，他的心灵是与所描写的那个民族性有活生生的血肉联系时，他才能有从研究那个民族的历史中得到益处。”可以说，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只能加强诗人的才能，但并不能赋予他以民族性的感情，假如他的天性中原没有这种感情的话。<sup>[1]</sup>但是，景宜又必须超越出来，摆脱传统白族民俗文化的完全束缚，她顺应一定的白族民俗，有其不得不顺应的必然性，既带有旧的白族民俗习惯所留给她的心理情感积淀，同时又能补充估量自己。而在她对白族民俗文化的观照下她自身的民族性只会更加鲜明。

### 3 景宜小说对白族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的继承与超越

景宜对白族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的择取，为小说本身服务的同时，也使她俯视生活，构建小说中的苍山洱海畔的物质生产生活，在继承民俗时又超越民俗本身。

生产民俗为物塑造添彩。景宜在被同化的白族生产民俗中超越出来用这一民俗为小说人物增添人格魅力，如《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阿黑吐着水喊，只见一条白亮亮的大鱼尾巴跃出水面把他掀了个斤斗，两个小伙子连忙扑上去，

在水里一阵翻腾，把一条娃娃一样大的鱼逮上船来。阿黑抓起一件干衣服擦尽身上的水，腹部被鱼翅划开个口子，殷红的血已经浸了出来”。这段描写了阿黑矫健的捕鱼人形象，小说中通过白姐视角对阿黑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动作外貌描写，把阿黑的形象与城里的海生对立起来，在这种对立中阿黑的示爱给了她“汪洋大海般的幸福”，让白姐奋不顾身的追求内心的真爱。

饮食民俗增添地域特色。大理的饮食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对饮食民俗的描写使得小说中地域特色浓厚，同时也为小说情节添彩。一方面，景宜的小说中社会大背景下大多数白族民众是不富裕的，所以她在小说中对饮食叙述的择取就带着享受的意味，如《白月亮》中，阿支波大哥赌输大队的两百元后东躲西藏行踪不定，“后来有人见他在小饭馆里吃腌生皮”。此时的阿黛姐姐正赖口求食，丈夫却在饭馆里吃生皮，让人唏嘘不已。另一方面，景宜小说中的饮食择取也带着普通白族温馨家庭的象征意味，《岸上的秋天》中“不一会混合着酸木瓜和辣椒味的鱼香飘进堂屋，老头子深深地闻着这味道睁开了眼。呆坐在桌边，目光凝滞，显得十分忧伤。”在这里的木瓜鱼象征着白族普通家庭里的温馨，而被儿子儿媳冷落的赵先生却连这种普通的温馨都得不到。被儿子儿媳折磨得孤傲古怪的赵先生，内心的屏障由于阿点点的和阿雪的关照一点点融化，在阿雪制作木瓜鱼时赵先生感触颇深。

服饰描写使人物生动具体。白族的服饰有其鲜明的传统特点，“白族妇女的上衣多为白色或接近白色的浅灰色，但袖管上却镶有艳丽的刺绣花边；上衣与领褂的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又和谐一致”，景宜的小说中很少去具体描写白族服饰，在涉及白族服饰的描写中往往是为了突出节气或强调人生礼俗之事。尤其多的是新婚嫁娶时描写新娘服饰营造一种幸福红火的氛围。在《骑鱼的女人》中描写“我”“围腰飘带上是金箔剪的鱼……她脚上的鱼鞋，还拖红尾呢”。突出“我”新媳妇的身份，为下文“我”被巴巴鱼嫉妒风言风语作铺垫。与白姐相同，作品的主人公“我”也有着做女人的自觉，同样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但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景宜有意塑造了“巴巴鱼”这样一个封建观念的忠实维护者来作为“我”的宿敌。“我”的言语和行为遭到了“巴巴鱼”的强烈嘲讽。白族传统礼俗的维护者与女性意识觉醒者展开了矛盾冲突。“我”的反抗，是女性意识的充分彰显，

而“巴巴鱼”的阻挠和羞辱，则体现出封建旧观念的顽固。

居住民俗构建生活背景。景宜的小说中很少有提及居所的描述，皆是典型白族旧宅“三方一照壁”的样貌。在《岸上的秋天》中描写笔墨较多，文中的梨园小旧宅寄托了赵先生所有的坚守，“他带着小男孩来到旧宅的门口，指着那古老的门楼和两叶雕有凤翅鱼尾的飞檐说：‘白族民居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瞧！这些蝙蝠斗拱变形美观，这曲线流畅的飞檐造型不正象一双凌空腾起的翅膀，令人心驰神往。’”民族特色居所最能体现民族信仰的，所以在这篇小说里白族特色旧宅连贯了全文慢慢推动事件的发展才能毫不违和。

交通民俗反映出行方式。景宜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作的小说，深受着文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者遗留的社会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人民生活愈加艰苦交通也未发达起来，对于世代代生长在洱海边的白族人民来说更多交通方式便是渔船，《新船》中描写的老船匠便是一生都围着船打转，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有只新船，“船”这个交通工具寄托了他全部的人生理想和对洱海的信仰。提及汽车和邮轮的是在《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白姐要嫁去梅里雪山脚下，在这里说明交通方式能突显白姐爱情的悲剧，不仅从“海的女儿”变成“山的女儿”，并且要忍受长途跋涉之苦。商贸民俗反映时代变化。在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的背景下，景宜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小说创作，或多或少受到了反思文学的影响，社会活动中商贸形式的变化尤为明显。如在《白月亮》中，朗早的悲剧中明线是原始母性意识的烙印，暗线则是社会大背景下对商贸活动的限制，从“她十多岁的时候正是洱海解放后最幸福的时光。合作社一堆堆白色的莲藕往城里拉”到“街上熙熙攘攘，虽然市场管理很严格，‘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闹得人心惶惶，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为了生活来这里拥挤、购买、争吵”由于。运动时商贸活动的限制，朗早和阿这才冒险去雪山背雪换大米造成朗早的悲剧。

#### 4 景宜小说对白族社会民俗的继承与超越

景宜对白族社会民俗的择取，为小说情节服务的同时，也给小说注入了灵魂，景宜对白族社会民俗的继承与超越，赋予小说作品精神内涵。

人生礼俗的运用深化了人物形象。《谁有美丽的红指

甲》里写了有关婚俗，送亲等，形象地指出两种不同婚俗背后女人的结局，白姐嫁在双月岛或嫁去梅里雪山脚下两种不同的婚俗，造成“海的女儿”和“山的女儿”的本质差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白姐的爱情悲剧的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两种婚俗所体现的对立。<sup>[4]</sup>两种不同的婚俗对于洱海边的女人来说，其实就是白族生活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表现。《白月亮》中花较大篇幅描写“披红戴绿的马车去到新郎家，几个包花头帕的老太婆就把新娘子朗早和新郎利树牵进新房。朗早悄悄地递了一块绣花手帕给利树，利树也悄悄塞给她一个系着彩线的小葫芦，走进房门朗早就按规矩把小葫芦扔进床底下，而那块手帕却要利树收留一辈子。朗早正是在这种喜庆的仪式感下成为利树的妻子，所以下文中利树出轨阿支波并且生下孩子才让朗早恨之入骨，在景宜笔下朗早也超越了白族传统民俗文化的制约选择人性中的真情。

岁时节俗是小说情节的助推。大理白族岁时节俗庞杂，景宜小说中择取了白族较盛大的几个节日，如三月街、火把节、本主节，她对岁时节俗的描述并不拘泥于流水式的述说，只是适切地选择节日中的节点或节俗来，详略得当地加以择取，白族岁时节俗的参与让她的小说故事情节得以发展、人物关系矛盾得以激化、小说中人物的人性得以展现。在《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前后涉及三年的光阴，故事情节都在火把节时得以重大发展，用它来集中人物，集中故事情节，在岁时节俗中人物感情的升华显得自然而质朴。小说开头“如果是火把节染不红手指的女人，她将被视为不贞洁。”[即使思想解放的白姐认为火把节可以不用染红指甲，但对岁时节俗崇拜的白族人民却始终坚持着这个节俗。美丽孤傲的白姐本就惹得双月岛上的女性羡慕嫉妒，当白姐违背节俗时一下子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白姐爱情悲剧的原因之一。景宜是深刻领悟白族岁时节俗的，她为白姐安排了一个乡村妇产医生的身份，在这个身份之下白姐本身就与火把节的这个习俗相冲突，基于此她从白族岁时节俗中超越出来将白姐化身为女性意识觉醒者违背了火把节涂红指甲的节俗。

白族口承语言民俗解释人物行为。景宜恰当地运用大量生动的白族谚语、白族俗语、白族民歌，使小说生活气息大增。民歌对于大理白族人民来说是语言一样的存在，既有流传下来的民歌，也有为了对调即时欢唱的，如《谁有美丽的红指甲》

中白姐每次彷徨犹豫的时候恰恰是“心胸和洱海一样广阔”的老海东吟唱一段大理民歌或者说出几句俗语就能让白姐景然有悟，如“祖先生你做什么？祖先生你来做人。阿嬷生你做什么？生你来捉鱼。”；在大家互相调侃打闹的时候也会用俗语让自己的言语更形象生动；甚至在骂人的时候谚语俗语的使用频率也特别高，如“又不出望夫云，你刮什么龙卷风”。

白族精神民俗贯穿景宜的每部小说作品。景宜在进行人物塑造时，不论人物何种性格，他的骨子里一定是透着对苍山洱海和本主的信仰，洱海的海浪、苍山的云朵都在指引着大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景宜用其浓郁的抒情笔调将生活中的民俗变形为信仰的象征，这样她的小说中就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息，字里行间彰显着白族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背后也是景宜的信仰，这是她生长在大理不可避免被同化的，而她超越出来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从小说人物传唱的歌谣中就可见一斑，《白月亮》中朗早她们挖雪时唱白族歌谣“世上有多少山啊，我们不知道，世上有多少人啊，我们不知道，苍山啊！是你养活了我们白族人，今天又挖你的白雪去换白米。”即使之后朗早被大雪埋没，阿这依然觉得她是投入了苍山的怀抱。《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走到天涯海角，也记住自己的名字‘白族姑娘’！”正是白姐对苍山洱海，以及真善美、坚强勇敢的白族姑娘的信仰，使她毅然踏上前往雪山脚下的路，在这里景宜对白姐的塑造中摒弃了包办婚姻

的民俗，超越性地赋予白姐坚持真、坚强勇敢的性格，使她在受尽双月岛上传统势力的攻击后依然踏上新征程。主人公大都处于禁忌边缘，在禁忌的立与破中求生存，如《白月亮》中阿这的母亲与朗早的丈夫偷情生下阿这，使阿这从小备受欺侮，违背道德禁忌的阿这母亲让儿子与自己一起接受违背道德禁忌的惩罚，小说中阿这与朗早的微妙关系变化在禁忌的破与力中得以呈现，人性的光辉在这个过程中被放大。

景宜小说作品中渗透的白族民俗文化既是白族人民的生活基石又是限制自由意识的枷锁。小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白族民俗世界中，白族民俗文化为底层人民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却又成为主人公生活悲剧的元凶。中国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在社会不断发展中，白族民俗文化与社会生活要求的某些对立更加凸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景宜的小说对白族民俗文化资源的择取与变形，实现了白族民俗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 参考文献

- [1] 景宜. 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文学再出发[J]. 少数民族文艺报, 2018-12-5:1.
- [2] 张亮采. 中国风俗史[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21.
- [3]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论文学[M].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8:87.
- [4] 鲁玉祥. 景宜《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白姐爱情悲剧探析[D]. 大理: 大理大学, 2011:1.